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徐可,徐冉,张晗.端午节庆习俗的“原魅”“祛魅”与“复魅”[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7(4): 21-25.

端午节庆习俗的“原魅”“祛魅”与“复魅”

徐可¹ 徐冉² 张晗³

(1.商丘师范学院 豫鲁苏皖接合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河南 商丘 476000;

2.郑州市管城区文化旅游体育局,河南 郑州 470000;3.郑州财经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南 郑州 470053)

摘要:端午民俗起源于巫术,其仪式具有超自然的神圣性和“原始之魅”。唐宋以后,端午节庆习俗的巫术性和宗教性持续淡化,呈现出世俗化的“祛魅”进程。现代社会中,端午节庆的生活性、实用性、娱乐性、功能性因素日益增强。随着端午习俗非遗文化融入旅游开发和文化产业项目,传统文化的神圣感和仪式感逐渐式微,文化“复魅”的社会诉求日益强化。中国具有悠久的礼治传统,“礼失求诸野”成为一种“复魅”的类型。人们往往忽视端午节庆所蕴含的抗争精神与生命意志的文化基因,中国人“不求神求诸己”的文化魅力与当代价值由此生成。

关键词:端午节;“祛魅”与“复魅”;神圣性;非遗文化

分类号:K8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4)04-0021-05

一、“原魅”:端午节庆的早期起源

端午起源有着丰富的文献内容。晋书《风土记》记载:“端者,始也,正也。五日午时为正中节,故作种种物避邪恶。”^{[1](P31)}辟邪禳灾是远古巫术的主题,而端午习俗与巫术、原始宗教和阴阳五行密不可分,充斥着对超自然力量和神仙的膜拜和信仰,从而被赋予了“原始之魅”。“原始之魅”具有思维建构上的“混沌性”,“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神话想象与巫术仪式体现了原始思维的时空维度,例如,“面死而生”的神话想象以“长生不死”的方法遮蔽了时间,“生存祈祷”的巫术仪式以“人神对话”的方法遮蔽了空间。这也从认识论的角度说明在中华早期文明的起源中,神话与巫术、节庆与习俗往往纠缠在一起。这本是早期文明“万物有灵”“人神两分”意识形态下的时空观与解读世界的初始方式。

首先,这体现了原始思维对时间过程流变性的反映。节日具有周期的节律性,也可以理解为“时间绵延”^①的符号与标志,其所表达的时间不是用钟表和日历来均匀度量的“科学时间”,而是存储于人类记忆芯片的“周期过程”。例如,五月正是春夏之交,这与后来的“五行学说”相勾连,即“五,五行也,阴阳在天地间交午也”^{[2](P575)}。段玉裁在《说文》中注:“水火木金土,相克相生,阴阳交午也。”闻一多指出:“一方面,龙的数即是五,所以在图腾社会的背景之下,‘五’便成为一个神圣个数,而发展成为支配后来数千年文化的五行思想;另一方面,作为四龙之长的中央共主是第五条龙,所以,‘第五’便成为一个神圣的号数,至今还流行着的五月五日的端午节,便是那观念的一个见证。”^{[3](P156~157)}

其次,端午节庆具有内容上的超凡性。早期先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仪式、象征与符号系统。在中

收稿日期:2024-03-10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委托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原则与世界意义”(2022DWT006)

第一作者简介:徐可(1969—),男,河南开封人,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文化经济学研究。

① 这是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在其时间哲学中表达和使用的概念。

国的农耕文明形成中,自然节律的周期更替不仅决定着农业生产,也决定着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岁时节日。而五月是春夏之交的季节,正是在这交接与转换中,端午节逐步从超凡性过渡到神圣性。

在这一过渡中,龙作为图腾符号,成为端午的重要标识。闻一多在抗战时期写了《端午考》《屈原问题》《端午的历史教育》等系列文章,旨在论证中华文明的先进性与神圣性,从而以文化自信来唤起抗战决心。当代学者也倾向于认为,“龙神信仰是端午民俗最核心的信仰要素,它贯穿了端午民俗自起源以来的整个历程,并始终发挥着巨大作用。正是这一信仰基础,实现了端午民俗潜在地与整个中华民族对龙的特殊信仰的统一。”^[4]

由此可见,端午源自于早期先民以天神地祇、阴阳交割为主要内容的“神话—巫术”体系,在漫长的农耕文明过程中,被赋予了超自然的神圣性与合法性,并与“五行”相附会,深刻影响了封建时期的礼仪、礼制和礼治。因而,在一定程度上,端午传统可謂是中华农耕文明的魅力之源。

二、“祛魅”:端午节庆的历史流变

“五行”是中国古代认识论的基础。《孔子家语·五帝》载:“天有五行,水木金火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5](P14)}因此,端午节庆具有文化分析上的元构性、时间过程上的初始性、价值体系上的超凡性,这些都是其“原始之魅”在不同维度的折射。端午“原始之魅”的混沌性和神秘性,在历史演化中逐步地地方化、生活化和实用化,越来越凸显其娱乐性、功能性和审美性,呈现出中国式“祛魅”过程。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以“祛魅”来解读现代性社会赖以生存的科学理性与市场理性。“祛魅”,即摒弃所有的“用于拯救的巫术手段”^{[6](P222)}。他认为:“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除魅’。”^{[7](P151)}而从端午节庆的习俗变迁来看,这种“祛魅”在现代社会到来之前,就始终在发生着。闻一多曾指出:“端午节逐步成为吴越地区图腾祭的节日,而赛龙舟是祭祀仪式中半宗教、半社会性的娱乐节目。”^{[3](P144)}这种“半宗教、半社会性”本身就是“祛魅”过程中的过渡环节。

(一)“祛魅”中的抗争意识:竞渡与采药的文化解读

端午“祛魅”过程首先表现为由“鬼神膜拜”转向“英雄崇拜”。关于端午节的起源,众说纷纭,这恰好说明了流变过程中的多样性、地方性、复杂性。从端午祭拜对象的演变脉络看,由超自然力量的膜拜逐渐转向张天师、钟馗等道教崇拜,然后固定于伍子胥和屈原等英雄人物,呈现出由神到人的世俗化过程。

端午“祛魅”的第二个表现,就是由“禁忌避讳”转向“药物医疗”。《礼记·月令》记载:“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斋戒,处必掩身,毋躁。”在古代,夏至是传说中的死神诞辰或下界日,因而也是“恶月”“毒月”“死月”,由此产生了驱邪避死的民风习俗,并逐渐集中于五月五日“艾草驱邪”,这成为端午采药的风俗起源。《荆楚岁时记》记载:“是日,竞渡,采杂药。”^{[8](P92)}江绍原《端午竞渡本意考》^①一文指出,龙舟竞渡习俗最初是古代先民祓除不祥的一种公共卫生法术活动,后来逐步演变为采药习俗。

竞渡与采药习俗隐含着强大的生命意志与抗争意识,这一点往往被我们所忽视。《武陵竞渡略》中提到“竞渡不独禳灾,亦在卜岁,俗说划船赢得了时年”^{[9](P49)},这里的“竞渡”与“赢得”说明龙舟习俗与竞赛游戏最早源于抗争,具有生存斗争的实践价值与意义。节令习俗往往蕴含着文化基因的遗传密码。美国哈佛大学神学院的大卫·查普曼教授试图用“局外人”的眼光解释中国远古神话,他认为,如果撇开“大禹治水”“愚公移山”“夸父逐日”“精卫填海”这些神话中的具体情节,转而去寻找其中要表现的文化核心,那么,只有两个字:抗争^②。而抗争是生命意志的直接呈现,不仅表现为生殖繁衍,更直观地表现为恶劣条件下的求生意志。

战争与灾害频仍,人们因而非常崇拜具有牺牲精神的悲剧式英雄人物。吴越一带曾把伍子胥崇祀为水神,在端午节加以祭拜。《续齐谐记》记载:“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皆汨罗之遗风也。”据考证,在唐代,端午节公务人员还放假一天^[10],可见端午节已由地方习俗上升为国家制度。

新文化运动时期,西风东渐,有人批评中国的审

① 《端午竞渡本意考》, <https://www.chinesefolklore.org.cn/web/index.php?NewsID=8201&Page=2>。

② 《哈佛教授:中国人自己都不知道的一个民族特征,却让他们屹立至今》, https://www.sohu.com/a/800801080_121164946。

美意识中偏好“大团圆”，缺乏西方的“悲剧审美”意识。^①这一说法并不准确。从习俗源起来看，端午节具有忧患意识和“不求神求诸己”的奋斗精神，这恰恰也是“祛魅”的内生性的精神力量，以现实的人的魅力取代超凡的神的魅力。从韦伯的视角看，人类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逐步祛除巫术和魔法等主观臆想因素，意味着人与神的主仆关系发生了倒转，这是近代理性乃至近代科学产生的前提。韦伯认为：“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起作用……而这比其他事情更明确地意味着理智化。”^{[3](P136)}

（二）“祛魅”中的审美意识：宋词与明清小说的世俗化

韦伯强调的“理智化”只是“祛魅”的路径之一，从日常生活角度看，“祛魅”伴随着文明进步和人们精神世界的世俗化变迁过程，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市井艺术”。随着城市经济与市井文化的繁荣，宋代端午风俗开始大众化、游戏化、娱乐化，其物化象征具有市井艺术的审美价值。北宋达到了中国文人艺术的时代巅峰，端午及其象征性艺术也融入了宋词歌舞的“大众娱乐”之中。北宋时期，“五色缕”已经成为端午的艺术符号，如杨无咎《齐天乐·端午》“更钗袅朱符，臂缠红缕”、黄裳《喜迁莺·端午泛湖》“玉腕彩丝双结”、梅窗《菩萨蛮·端午》“色丝添意密，密意添丝色”，等等。而南宋时期流传最广的是蔡戡《点绛唇·百索》：“纤手工夫，采丝五色交相映。同心端正。上有双鸳并。皓腕轻缠，结就相思病。凭谁信。玉肌宽尽。却系心儿紧。”婚恋是日常生活中最盛大的仪式，“五色缕”成为端午日常生活审美的典型样本。

在儒家知识分子眼中，端午不仅成为艺术审美的物化对象，还因屈原而被赋予更为深厚的历史审美意境。例如，陈与义的《忆秦娥·五日移舟明山下作》：“独无尊酒酬端午。移舟来听明山雨。明山雨。白头孤客，洞庭怀古。”该词作于金兵入侵、国难当头的1129年端午节，陈与义正在避难途中，自然想到了屈原和千古兴废。更为知名的是苏东坡的《六么令·天中节》：“虎符缠臂，佳节又端午。门前艾蒲青翠，天淡纸鸢舞。粽叶香飘十里，对酒携樽俎。龙舟争渡，助威呐喊，凭吊祭江诵君赋……汨罗江渚，湘

累已逝，惟有万千断肠句。”苏东坡不仅描述了端午习俗，而且还借屈原抒发了历史情怀。

及至明清，端午节已经融入人情往还的世俗惯例。例如，《金瓶梅》第二十四回写道：“这日是端阳佳节，他也无心去游戏，衷心忖道：我到老铁家去。今日大节下，他必定在家。”可见，端午被视作“大节”，也是亲朋好友相互往还的社交时机。《红楼梦》第三十一回写道：“这日正是端阳佳节，蒲艾簪门，虎符系臂。午间，王夫人治了酒席，请薛家母女等赏午。”

由此可见，“祛魅”就是世界的世俗化和理性化发展过程。与远古社会的神秘叙事相比，这是人们认知视角的转变、价值依据的置换和社会秩序的重构。从端午习俗演变来看，汉唐时期以“英雄崇拜”置换“神灵膜拜”，以“采药施治”代替“驱邪避灾”。到了宋代，端午节庆日常审美化，更是一种艺术化的“祛魅”方式，尤其是宋词开始在坊间流行，本身就是生活化和世俗化的过程。到了明清，端午已经成为人际交往的惯例，“赏午”也带有更多的游戏和娱乐因素。这种世俗化进程标志着端午“祛魅”的不同历史阶段。

三、“复魅”：端午节庆的当代价值与精神慰藉

从根本上看，“祛魅”是一种革命力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有段名言：“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褻渎了。”而这一历史过程，也可以解读为“资本的祛魅”，资本的世俗力量打破了封建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神圣性，从而开启了市民阶层与资本主义的新时代。

然而，“祛魅”并不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单行道。近代以来，科学理性和现代社会的“程序理性”深刻地改造了欧洲的传统社会。随着现代社会“祛魅”的完成，科学理性也越来越混同于“工具理性”“市场功利”和“实用主义”，人们逐渐感到了物质富裕条件下的“精神无所皈依的迷茫”。正如韦伯在《以学术为业》的演讲中所说：“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

① 蔡元培曾说“西人重视悲剧，而我国则竟尚喜剧”，王国维曾说“中国小说都是乐天的，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胡适曾说“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的观点”，等等。

已被除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最高贵的终极价值观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进入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3](P151)}

因此,当代人不满意理性启蒙所造成的人生价值与意义的缺失,又兴起“复魅”的社会思潮与动向。当然,这绝非要恢复巫术和神秘法力,而是对当下“科学主义”“工具价值”“市场功利”和“内卷竞争”的一种抗拒,试图从传统文化资源中找到精神慰藉、审美价值,从而实现对自身的终极关怀。

(一)国家意志:文化自信的顶层设计

2017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提出:“中华人文精神是中国人民‘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样式、审美追求的集中表达’,我国传统文化振兴战略,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要恢复传统文化的神圣性。这在端午节庆上也有所体现。”

2008年,端午节成为国家法定节假日。2009年9月,端午节成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项目。2016年5月,国务院批准端午节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是国家制度从顶层设计上对端午节的正式承认。而屈原是儒家精神的文化符号,具有维护“大一统”的“正道直行,竭忠尽智”“其志洁,其行廉”和“忠君爱国之诚心”等思想内核,是当代家国情怀的经典样式。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吟诵屈原的诗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脱贫攻坚是新时代的抗争精神的伟大实践,因而具有价值正当性和意义的神圣性。

端午与春节、清明、中秋并称我国法定假日的传统四大节庆,其背后体现的是国家意志对端午文化的褒扬和神圣性的构建。从地方实践上看,区域文化的发展动机也与国家意志相互重叠。在“振兴传统文化”战略的大背景下,端午习俗内容丰富,地域特征明显,受到高度重视。

除了大规模的龙舟赛事以外,浙江嘉兴组织的端午掳牛颇具特色。它源自宋元时期穆斯林的“抓牛”技艺,后又融入“船拳、心意六合拳、查拳”等传统武术,成为多个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美美与共”的样

板。角力竞技源自古老的祭祀活动^①。自2012年起,嘉兴市每年端午期间都会举办中国掳牛争霸赛,这吸引了国内外大力士的积极参与,成为当代东西方“力士文化”交汇的焦点。

(二)非遗文化:“复魅”的关键场域

当前,全国各地的非遗文化振兴和非遗项目建设方兴未艾,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复魅”趋势。非遗文化包括“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与表演艺术”“社会风俗与礼仪节庆”“传统手工艺”等,其源头都含有人们超脱日常生活的“崇拜”“献祭”“狂欢”等神圣性因素。

传统文化的神圣性在现代理性面前并没有被消弭殆尽,而是在民间习俗中借助非遗文化有明显的复苏迹象。中山大学王霄冰等人于2011年清明期间,对曲阜祭孔仪式进行了跟踪调查与研究,发现公祭仪式的世俗化特征明显,仪式手段贫乏,缺乏吸引力,而民间祭祖礼仪在本真性、本土性和传统性方面更具感染力。^[11]这充分说明,如果完全抛弃了对神灵的虔诚与敬畏,非遗文化项目只是大规模有组织的文化演出,虽然场面极具排场和豪华,仍会削弱、丧失非遗文化中的“仪式感”和“乡愁”的价值、意义。依靠行政力量组织的非遗文化项目,本身就是“法理型”的社会治理的产物,这恰恰是以失去民间“魅力型”治理的魅力为代价的^②。

中国具有悠久的礼治传统,而民风习俗则构成其金字塔的底层。如果在现代的科层体系与市场机制中,个人的价值和创造性被“同质化”和“原子化”,那么礼治所维系的差序与等级结构也不复存在,因此,“礼失而求诸野”,成为中国式乡村治理“法治—自治—德治”体系的“复魅”诉求。这也提示我们要对当前的非遗产业化进行反思。当前,除了市场规模和社会需求因素之外,非遗产业化的一个内在悖论是:一旦采用工业制造工序和生产流水线,则有可能会减弱手工艺品的工匠的虔诚精神和艺术的魅力价值。^③非遗文化项目的产业化与标准化,将会消解手工制品的神圣性,这种工业“祛魅”将会与大众的“复魅”旨趣产生尖锐的矛盾。

与端午有关的非遗文化内涵丰富,种类众多。这一方面有利于夯实非遗文化产业发展基础,另一方面也增加了“讲好端午故事”的难度。要摆脱当

① 徐州出土的汉代石刻《力士图》,被认为是汉代礼乐文化影响下的祭祀活动。

② 韦伯的“祛魅”理论就是为了论证现代社会的“法理型”统治类型和“魅力型”“卡利斯马型”有所不同。

③ 英文中,“art”一词原本就带有手工制作的涵义,甲骨文中的“艺”字也起源于祭祀仪式。

前文旅融合中千篇一律的现代化“审美疲劳”，“复魅”是最为根本的举措。其实，非遗文化中的“表演、仪式、竞技、游戏、手工技艺”等都是源自于人的原始本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呈现方式。因此，非遗文化必须改变其表演性，不是为了游客演出，而是出于原居民的内生精神需求。只有这样，非遗文化才能走上“复魅”的振兴路径。

当代非遗文化中的核心魅力在于展示地方族群的原生态的“人的本质力量”，呈现民间的仪式神圣性和手工技艺的虔诚性。因此，应矫正非遗文化的过度产业化，在工业生产与手工创造之间求得适当规模的平衡，进而强化乡俗与礼治中的情感因素与精神因素，增强非遗文化的感染力和吸引力，真正复兴非遗文化。

(三)端午文化：当代文创与审美旨趣

当然，“复魅”绝非“祛魅”的可逆过程。时代不同，时代精神的旨趣也大相径庭。当前的“复魅”绝非是复古，神圣和虔诚背后所凸显的往往是故土乡情和家庭伦理等价值内核，在数字时代呈现出时尚化趋势。

首先，端午的当代魅力体现为端午审美的大众化趋势。汪曾祺认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抒情诗”，“家乡的端午，很多风俗和外地一样。系百索子。五色的丝线拧成小绳，系在手腕上。”^[12](P125)“百索子”显然就是由宋代“五色缕”演变过来的。汪曾祺在作品创作中完全融入地方风俗，唤醒了人们的乡愁和日常生活的审美。他在《端午节的鸭蛋》中写道：“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自己去挑一个。鸭蛋有什么可挑的呢？有！一定挑淡青壳的。鸭蛋有白的和淡青的两种。二要挑形状好看的。别说鸭蛋都是一样的，细看却不同。有的样子蠢，有的秀气。”^[10]在汪曾祺笔下，鸭蛋成为灵性的审美对象。萧放认为：端午民间文学主要集中于民间传说故事、民间歌谣与民间谚语三种类型，而从流传演变的发展趋势上看，主要还是集中于家庭伦理的内容。前文曾论述，宋词推动了宋代端午节庆的“祛魅”过程，使其由超凡世界进入市井坊间。而在当前的“大众审美”^①阶段，审美已经成为人们超脱现实功利的精神

追求，因而也成为现实中“复魅”的另一种途径。

其次，端午的当代魅力还体现为端午文创的时尚性审美价值。河南卫视在推出《唐宫夜宴》《元宵奇妙夜》《清明奇妙游》之后，又制作了《端午奇妙游》。这些节目迅速成为网红文创作品，其艺术魅力在于文化创意与科技手段相互结合的奇妙性和时尚性。其经典形象大多取自传说人物，通过数字技术加工后，令人耳目一新。这种奇妙感通过人们的无限想象而达到了审美境界。

近代西方经济学的奠基者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指出：世界历史的两大构成力量，就是宗教和经济。自市场经济改革以来，我国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但也造成了内卷化与功利性竞争的全民焦虑。因此，传统文化的“复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人们宗教般的慰藉。此外，东西方文明演进的路径不同，“祛魅”与“复魅”的方式也不同。端午节庆源远流长，在历史流变过程中“祛魅”与“复魅”交织更替，其中的抗争意识、生命意志、家国情怀、日常审美，凝聚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显著特征。这些文化基因将随着时代变迁不断被激活，不断增加新的时代内容，也不断增添新的时代魅力。

参考文献：

[1]周处.风土记[A].车吉心,中华野史(先秦至隋朝卷)[M].济南:泰山出版社,2000.
[2]董莲池.说文解字考正[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3]闻一多.神话与诗[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4]孙正国.互动演化:当代端午民俗的文化思考[J].民俗研究,2003(3).
[5]孔子家语[M].王肃,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6](德)马克斯·韦伯.社会学文集[M].阎克文,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7](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简惠美,康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8]宗懔.荆楚岁时记[M].谭麟,译注.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
[9]杨昌嗣.杨昌嗣集[M].梁颂成,校.长沙:岳麓书社,2008.
[10]张勃.中国古代社会的节日休假[J].文史知识,2014(3).
[11]王霄冰.仪式的建构与表演——2011 清明节目曲阜祭孔与祭祖活动的人类学考察[J].文化与遗产,2011(3).
[12]汪曾祺.端午的鸭蛋[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

责任编辑 叶利荣 E-mail:yelirong@126.com

① 即日常生活审美化，由英国学者迈克·费瑟斯通于 1988 年提出。